



国防大学 2 064 4035 0

非常中国



F E I
C H A N G
Z H O N G
G U O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 回 企业像座城市 3
- 回 产权明晰：企业的根本问题 11
- 回 股票：是投资还是赌博？ 26
- 回 德国式？美国式？日本式？ 40
- 回 经济起飞的经济政治学 54
- 回 机构改革：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63

第二章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

- 回 令人吃惊的“太平洋经济” 74
- 回 “雁行模式”与“扇形结构”
..... 85
- 回 中国与东盟的微妙关系 92

回	“大中国经济”的威力有多大？ ...	100
回	不可回避的分歧	108
回	心急如焚的台湾	114
回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中国	117

第三章 香港：中国的一个支点

回	决不能拖香港的后腿	129
回	香港的好处何时显现？	133
回	拥抱香港，决不能捆住香港 ...	137
回	香港的黄金时代	141
回	为什么说邓小平再造了香港？	147
回	中国为什么保护香港	154

第四章 “新四国”演义

回	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	164
回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略	180
回	“戏剧性”的中俄关系	186
回	俄罗斯需要中国什么？	190
回	剪不断理还乱的中日关系	197

回	中国的成就与未来的挑战.....	212
---	------------------	-----

第五章 中国能否成为未来赢家

回	2001年：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232
---	----------------------	-----

回	2020年：了解现在与预卜未来.....	235
---	----------------------	-----

回	中国必须为21世纪做好准备.....	238
---	--------------------	-----

回	全球经济的危险处境.....	246
---	----------------	-----

回	赢家的基本准则.....	254
---	--------------	-----

回	中国的最后机遇.....	258
---	--------------	-----

回	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政府的承诺依据什么.....	262
---	-------------------------	-----

第六章 结构调整与21世纪战略

回	中国经理面临的挑战.....	268
---	----------------	-----

回	中国经理的酸甜苦辣.....	274
---	----------------	-----

回	新联邦经营.....	288
---	------------	-----

回	多极化经营.....	296
---	------------	-----

回	高混合型经营组织.....	302
---	---------------	-----

回	市场信息与企业集团	311
回	集团成功改组的四大原则	315
回	企业并购的世纪风	323
回	令人忧虑的失业	337
回	中国就业新举措：基建投资 7500亿美元	346

第七章 老百姓的命根子是什么

回	要公平竞争，不要黑心肠	354
回	经济的基本权利	364
回	老总，你个人该得多少？	369
回	福利能导致懒惰主义吗？	383
回	政府和市场的分工	391

第一章 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在这世纪之交的1998年初，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正在目睹，也正在参与一场史无前例的生产力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引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各个角落、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变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之中，最伟大的一句话恐怕莫过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了。由科技带头，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政策体制，我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处在巨大的自我调整和变革之中。

回首刚刚过去的1997年，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这伟大的变革。过去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鼓舞

下努力奋斗的一年；过去的一年，也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结束了十三万万中国人民心头挥之不去的被奴役的历史，结束了霸权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的历史。香港回归，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六千万香港同胞汇入祖国十二亿的人民之中，成为十三万万中的一分子；九月十二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这次大会，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许多方面尤其在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突破。这次大会，必将把中国带入繁荣的21世纪。

一切都在变。经过风风雨雨的1997年，世界各国的合作明显加强，尤其是双方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切都在变。在这变化之中，我们听听这些国外经济学家谈中国问题，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的方向，是大有益处的。

企业像座城市

企业怎么会像城市？这确实是别具一格的说法。本来，企业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处于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当然，它们也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它们都是历史的概念，但这太宽广了，和这两个概念离得更远的概念，如原子弹等也有这个特点。

企业是和商品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概念。自然经济条件下，是没有企业的。传统上，经济学家把企业看作一种追求产业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单元。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出发，认为企业即生产单位，是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一定产出的经济单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的风险增大，于是，人们便认为企业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单位，它集合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一体，创造一定的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它的目的是生存、发展、及其长远的最大获利。这三个目标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没生存，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获利；没有获利，生存下去也没什么必要，更无发展。为了实现以上三个目标，它就得与其它企业竞争，

其产品或服务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这样它就必须承担风险。一般来说，风险越大，它所需要获得的利润也越大。在风险和获利之间，企业追求获利最大却追求风险最小，为实现这个目标，它必须注重自身的效率，注重自身的经营。因为其最高目标是长期获利最大化，所以，其经营必须是以资本的运营为基础，追求资本的增值最大化。

而城市往往是社会意义上的概念，它是特定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一定的人群工作、居住、生活的地方，在城市这个范围内，有工厂，有政府机构，有军事设施，有教育单位，有文化娱乐设施，有福利设施……总之，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城市里边都应该有。

企业和城市，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患，便是企业像城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莫顿·米勒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单只是工厂，它们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它单位，很难把工厂和非工厂的部分区分开来……真正的工厂的那部分里边有4万工人，但整个工厂却有40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不仅经营工厂，还有邮电和其它事业。在中国，有许多企业，他们甚至开办学校，……我们把它们叫做‘公司城’，它们过去通常在边远山区，如开发煤矿等。没有文化设施，于是煤矿

公司自己开办学校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消息报社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纪之交，改革已处于攻坚阶段，国企业的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企业像城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从企业的历史起源和开展活动的目的看，企业都是一个履行经济功能的经济单位，它的中心任务是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功能，还要承担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从政治功能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最初都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国的国家政权一般都延伸至企业内部，使企业成为政权的基本单位。众所周知，我们的国有企业大都是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转变来的。当时对这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初步地改变了企业制度、企业的机构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把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兴办公营企业的一些成功做法移植到了这些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在企业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2）确立了办企业的指导思想，即以生产为中心，用生产来保证市场的供应和支持新生的红色政权；
- （3）在企业中实行三大民主制，即政治民主、经济

技术民主和管理民主；

(4)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办企业精神。

从这之后，在企业的管理原则和企业制度方面，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当时的苏联模式的要旨主要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济核算制的原则；一长制的原则（即企业及其所属的每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对所领导的单位的工作全面负责，全权处理该单位一切生产行政问题，该单位的全体人员必须服从这个领导人的命令和指挥）；经济责任制的原则；责任和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原则。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企业制度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受政治的影响，企业必须服从于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例如1960年制定的“鞍钢宪法”，其中阐明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经营的原则，第一是“坚持政治挂帅”，第二是“加强党的领导”。企业成为行政单位，其职责变成了执行上级的计划，至于这计划造成的结果，企业是不过问，也是无权过问的。

从社会功能来看，由于就业制度上的“铁饭碗”和“终身制”，使职工一旦进入企业后就很少流动，与企业保持长期的固定关系。另外，还由于我国分工专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程度比较低，由此，使企业成为一个社会单位，它不仅要为职工提供劳动资料，还要提供各种社

会服务、公用事业和生活福利设施，以满足职工的生活需要和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一来，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它简直是一座城市，既负责经济方面的事，又有政治方面的事，还有武装部、公、检、法等司法单位，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理发、娱乐等服务单位……一个城市应具有的功能，企业基本上全具备。

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特别突出，这种传统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国有国营，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这种企业制度对全民企业的财产采取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形式，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进行管理和调配，国家各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既是企业的拥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每个企业只不过是全国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而政府的目标有经济方面的，更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整个社会治理好，因此，作为全国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的企业，也就成了一个职工生、老、病、死、伤、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小社会。它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成为一致的，它的功能和城市的功能也是一致的，一个工人从他进厂的那天起，吃喝拉撒睡，都可以“足不出厂”，直至老死，企业不仅负责生产，更要为这么多的职工提供很多例如住房、学校等社会服务，企业成为反映整体社会理想的“小社会”，这种社会组织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成鲜明对照，与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要求格格不入。

1964年的中国，资金紧缺，百废待兴，国家贫困，交通设施非常落后，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唯一方法是把资源集中起来，中国版图之大，加上不完整的道路网、铁路和通讯，使“小社会”的产生合乎逻辑，传统的人际关系，使其在地区上组织起来更为容易。最后，对饥饿和动乱的犹新记忆，使人们珍惜安全稳定的现状大于对繁荣的憧憬。由此，“小社会”内部的稳定，“小社会”内部的无所不包，便在改革开放之前固定下来，这使得企业内部机构十分庞杂，难以指挥。企业内部行政机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套机构系统并存、重叠，并且每一套机构都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妨碍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企业内部闲杂机构多，这些机构的存在，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毫无关系，它造成了机构的过份膨胀，形成了“一线紧、二线松、三线肿”的局面，增加了企业的额外负担。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又使企业的发展目标扭曲。企业没有根据内在经济利益的动力，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利润，也就没有把眼睛盯向市场，按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方向，开发新产品、引进先进技术、降低成本等，而是双眼紧盯着上级，为企业的稳定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成为企业的目标。企业以一个处在主体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企业的目标发生了变异。

应该说，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方式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国家实力得以迅速增强。但企业像城市这种现象同时也带来了今天国企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企业社会负担过重，企业社会化的现象带来社会的稳定的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下边是来自世界银行的一组资料。

国企的负担：

国企中富裕劳动力占总劳动比例：12.35%

国企承担全国居民住房的比例：50%

国企中退休人员数目：（百万人）20

附属于国企中的中小学：（万所）18

国企附属学校中的老师和行政人员（百万人）：6

这种情况使得其效益持续下降，失业人数大增，部分国有企业工人发不出工资，经济发展面临障碍。因为国企亏损和效益下降使得国有资产不能获得有效的保值增值，使有限的国家资金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

这种情况又使得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很大障碍，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不了，因为好多企业动辄就是数十万人，破产容易，数十万人的安置就很成问题。

国家正试图在这一改革道路上有着极大障碍的领域中进行改革，国企也试图把其内部的福利单位改为服务公司，通过其向公众出售医疗服务、食品等来创收。

政府也已开始创立了一套养老金和福利体系，从1984年起，各地已开始建成一套雇员和雇主都交纳定额供款的养老金制度，现在，这一制度已向全国范围内

推广，不只如此，现在还建立了失业基金，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正准备建造补贴住房，许多城市的就业中心和再培训计划已成为新的时尚。企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其“小社会”的面貌。

但这项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全面地看，国有企业现在仍在经营11万家医院和诊所，并雇佣了大约140万名职工，占全国医务人员的三分之一，国有企业还有18000家中学和小学，雇佣了60万名教职员工，如果由国家来接管这些医院和学校的话，每年的工资支出就需960亿元人民币。把1500万被认为是生产性冗员的职工裁掉，国家就需要每年支付300亿元人民币的失业基金，而现在这一基金的规模只有40亿元人民币，目前2000万退休职员对正在发展中的养老金计划带来更大的资金需求。

社会福利负担不仅庞大，而且分布不均，新的企业自然有较少的老职员和退休职员，在更有效的工厂内，富余人员通常较少，在一些最糟糕的国有企业中，每个职员平均要负担一个退休职工。在广州，在职员工与退休员工的平均比例为1.98:1，而珠海则为10:1，在传统的采矿行业里，养老金支出要占工资支出的25%，而银行业只占10%。

这就是企业像城市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米勒指出，如何安排工人才是问题所在。要关闭工厂，而工厂实际上是个城镇，这就使得企业处于要死

不能，要活无法的境地。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其解决也要有一个过程，没有任何希望的企业可以有规律地每年关闭其中的5%，让人们知道有3年或更长的时间作调整的准备，让他们最好尽早计划未来。政府的职能也应马上从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学校、医院等。当然可以让学校、医院也股份化，这样，钢铁厂就只生产钢铁，而不开学校、餐厅、旅馆等。

产权明晰：企业的根本问题

经济改革，说到底最根本的是企业制度改革，因为企业是市场中的最基本的主体，中国的企业改革，重中之重还是国企改革，谈国企改革，主要的还是要认清国企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是由长期遗留下来的企业制度问题引起的产权问题。

企业制度是一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它决定着企业的资产运营和经营机制。企业制度的形成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的某些要素。人们普遍认为，在古罗马包税人的股份委托公司中，就可以看到企业制度的一些前兆。在奴隶社会，史书上亦有部分被解放的奴隶按一定的章程集资兴办“企业”的记载。

在漫长的中世纪，有关企业制度的记载就更多。在当时的采矿冶金业中，由于生产技术难度较大，投入的资金较多，个人的资金不足以胜任，因此兴起一种合股经营的方式，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入股出资，合伙经营，共享利润。如果经营失败，损失由大家分担，以后随着采矿冶金技术的提高，要求添置更复杂的设备，需要更多的资本。从14世纪起，就出现了新的合股公司。这种公司的规模比过去大得多，而且持股者多为贵族、地主、商人、教会等，他们远离矿山，只分配生产出的金属及将卖掉金属所得的钱作为红利，具体的经营则交他人负责。从这时的企业制度中可以看出已出现了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萌芽。

除了民间的集资形成的企业之外，当时，国家也利用股份形式集资，特别是为了战争的需要筹措巨资。如12世纪热那亚人为了远征塞浦路斯岛，就成立了一个为征服和发展这个岛屿的股份信托企业“MAONE”。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在当时的纺织行业也较流行。14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如米兰、比萨、佛罗伦萨等，纺织业已相当发达。当时仅佛罗伦萨就有3万人从事毛纺织业，有200个毛纺织企业，每年可生产呢绒8万匹，而米兰在14世纪末期则有这种企业363个，其中267个是个人经营的，96个是合伙经营。

在中世纪，新的企业制度的出现与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兴旺直接有关。这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